

王晓秋 尚小明 主编

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

——晚清改革史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资助

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

——晚清改革史研究

王晓秋 尚小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5522

DK71/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王晓秋,尚小明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

ISBN 7-301-03544-6

I. 戊… II. ①王…②尚… III. ①戊戌变法-研究-中国-清后期
②政治改革-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K256.5

书 名: 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

著作责任者: 王晓秋 尚小明 主编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544-6/K·0239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32开本 10.125印张 270千字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6.80元

目 录

总论:晚清改革史研究论纲	王晓秋(1)
--------------------	--------

上篇 戊戌维新研究

康有为的仿洋改制与戊戌维新	王晓秋(21)
张荫桓与戊戌维新	马忠文(55)
晚清外交官与戊戌维新运动	杨 易(87)
英国对戊戌政变的态度	周光辉(114)
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成败原因之比较	王晓秋(127)

下篇 清末新政研究

留日学生与清末宪政改革	尚小明(143)
清末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及其运作	汤钦飞(169)
外务部的设立及清末外交制度的改革	高超群(202)
留日学生与清末军事改革	尚小明(230)
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工商政策	丛月芬(256)
清末的清理财政	赵学军(286)
余论:晚清改革的历史启示	王晓秋(314)

总论：晚清改革史 研究论纲

王晓秋

一、现实呼唤的历史课题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时代和现实的需要，往往比千百个理论家的冥思苦想，具有更大的推动力。历史学也不例外。

当前，中华儿女正在加速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向 21 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候，回顾和深入研究百年前中国晚清时期改革的历史，有着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步、实现社会变革的两种主要形式。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往往出现把暴力革命的作用绝对化，而轻视渐进改革的倾向。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般也偏重于近代革命史的研究，而对晚清改革史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

如果把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们的改革呼声，作为晚清改革的滥觞的话，那么，整个晚清时期，由清王朝统治阶级进行的改革，主要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 19 世纪 60 至 90 年代的所谓同光新政。这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双重冲击下，由清王朝中央和地方的洋务派官僚

发起推行的一系列军事、经济、教育方面的改革。第二次是 19 世纪末的戊戌新政。这是在甲午战争后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光绪皇帝在维新派官僚、知识分子的策划、鼓动下，进行的百日维新。百日维新颁布了大量新政法令，试图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各方面，实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第三次则是 20 世纪初的清末新政。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当权派，不得不充当刚被他们扼杀的戊戌维新的“遗嘱执行人”，在资产阶级立宪派和归国留学生的推动和参与下，进行了预备立宪、改革官制、制定法律、建立新军、废除科举等重大改革。这几次改革浪潮虽然最终仍未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覆灭的命运，但它们毕竟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步和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对于晚清改革的历史，至今尚未有总体和系统的研究。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晚清改革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深入探讨晚清改革与中国近代化进程、民族兴衰以及人民革命之间的关系。全面研究晚清改革的来龙去脉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法律、风俗等各个层面。具体剖析晚清改革的时机、条件、环境、社会承受力；改革的指导思想、动机、纲领、政策、策略；改革领导人和执行者的素质、行为、心理，改革遇到的阻力、困难，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以及改革失败的原因等等问题。深刻总结晚清改革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进而还可以把晚清改革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改革进行比较分析。

通过对晚清改革史作多角度、多层面的宏观和微观的全方位研究，不仅可以拓宽和深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而且可以总结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探索社会改革的运作规律和改革中各种因素的互相作用与制约关系，为当代中国现实的改革事业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历史借鉴和启示。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视角

历史研究者本身实践与认识的深化和观念与理论的更新，对历史研究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而社会现实又对历史认识不断产生有力的推动和制约作用。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通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对改革以至改革历史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思想观念正在发生转变。有些以前颇为流行的传统观点，经过反思、推敲，感到有必要加以修正或更新。当前迫切需要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新的角度、新的观念、新的方法，发掘新的史料，开拓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从晚清改革史角度涉及的最重要的观念理论问题恐怕还是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及如何评价晚清改革的历史作用问题。

过去由于“左”的思想与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及革命高潮时代遗留的心态和价值取向等影响，我们往往把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无限夸大与绝对化，似乎革命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又是随时随地可以发动的事情。反之，对统治阶级实行渐进改革的作用则加以贬低，甚至把它与革命完全对立起来，似乎凡是主张渐进改革就是抵制革命或反对革命。实际上，这种观念和思维方式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曾经强调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将引起革命”。^①人类社会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断矛盾变革的新陈代谢之中。这种变革主要通过两种形式来实现，一种是在原有社会秩序下渐变的改革，另一种是使原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620页。

有社会秩序发生突变的革命。两者之间有着复杂的辩证关系。当着革命形势还不成熟的时候，改革便经常发生并起着进步作用。只有当社会改革的量变积累到相当程度，社会上层和下层都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且革命形势和发动革命的主观力量都已经成熟的时候，革命才会到来。而当新的社会秩序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起来之后，又为渐进的改革开辟了新的道路。从晚清改革的历史可以看到，洋务改革引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西方文化，戊戌改革倡导了民族觉醒和思想启蒙，而清末改革则废除了科举、建立新军、预备立宪，推动了中国工业、政治、军事、教育近代化。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变革，才有可能出现逐渐壮大的中国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大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学生、留学生、新军官兵，才有可能在革命形势和条件成熟时，一举实现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和最终取得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胜利。因此研究晚清统治阶级的改革，决不是贬低和否定近代人民革命的作用，而恰恰可以更具体地理解分析近代人民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发生的背景和原因，考察研究革命力量如何逐渐形成壮大，革命形势如何逐步发展成熟，以及由于清政府改革的延误失败而导致各阶层革命化倾向的加强以至革命的爆发，并更深刻地揭示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与历史局限性。

对晚清改革历史作用的认识也涉及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应该是使中华民族赶上世界潮流，把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改造成一个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工业化国家，也就是实现中国近代化的目标。只有近代化才能使中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近代史上的历次革命、改革及各种反侵略战争、爱国运动、民众斗争，都是为了实现这一根本任务的不同方式和手段。

如果从这样的视角去考察评价晚清改革的历史作用的话，我们就不会停留在仅仅分析清王朝统治者企图以改革来维护自身统治的

主观动机上。而应该看到，晚清的几次改革高潮，客观上都是中国近代化（或称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同光新政的洋务改革，引进了西方机器生产、军事技术和文化教育，兴办工矿企业，开设新式学堂，创建近代海军，派遣留洋学生，跨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而戊戌改革第一次全面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纲领和政策，下令精简机构，兴办实业，编制预算，训练新军，创立京师大学堂等，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近代化运动的首次尝试。清末改革则进一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法律，实行了废除科举，建立新军，起草宪法，设立资政院、咨议局等重大改革，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重要一环，也为辛亥革命后民国时期的近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用这些观念去反思，那么过去流行的一些观点应该修正。例如说“洋务运动是反动的运动”，主要是根据洋务派官僚大多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出身或造枪炮对付人民革命而下的结论。但是如果把洋务运动放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它走出了符合历史潮流的近代化改革第一步，怎么能说是反动的呢？

又如说“戊戌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改良基本上是改革的同义词，可是改良主义一般是指革命时期对抗革命的机会主义思潮。而戊戌时期，革命条件尚未具备，革命形势远未成熟，怎么能把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维新变法定为改良主义呢？至于说因为它是改良主义运动，所以必然失败，更是一种简单的公式化推理。戊戌改革的失败有着极其复杂的主客观因素，需要作具体的分析，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而且在东方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也不一定必然失败，同时代的日本明治维新和泰国拉玛五世改革不就是取得成功的先例吗？

还如认为“清末新政不过是一场政治骗局”。诚然，慈禧太后和清政府推行清末新政的意图当然是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但是我们判断历史活动的性质和作用，不能仅仅根据其主观动机和

主持者身份，更要考察其内容和客观效果。清末改革的内容从废除科举到预备立宪，都是涉及根本体制的变革，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就拿废除科举实行新学制来说，对思想启蒙和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意义极大，怎么能用“政治骗局”来一言以蔽之呢？

在研究模式上也有待更新。以往中国近代史教材著作，基本上是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八大事件的分段论述。每个大事件的研究也往往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有些事不属于八大段之列，就得不到充分研究，例如清末新政，某些近代史教材上基本没有反映，或者只是在辛亥革命部分作为背景轻描淡写，很少有专门论述，而且晚清几次改革高潮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很难体现。

过去中国近代史研究一般以政治史、革命史为主，这几年来也加强了近代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专史的研究，这些都是很必要的。但中国近代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其各子系统、各层面互相联系、制约、渗透，应该作综合的系统研究。具体到晚清改革也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改造系统工程，不能把晚清改革史单纯作为一个政治史或事件史来研究，必须作全方位的综合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也应该力求多样化。在晚清改革史研究中迫切需要引进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可以采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改革的社会承受力、社会舆论等问题。利用心理学方法，分析改革的心理反应和改革者的心态性格。也可以应用文化学方法，探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冲突、融合等问题。吸收民俗学方法，研究改革对社会习俗变迁的影响。还可以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获得对改革广度、深度反应的种种量的数据。此外，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很重要，可以把晚清改革与中国古代的改革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改革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还可以探讨中外改革之间

的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等问题。总之，这些方法都有助于扩大视野开拓思路，加深对晚清改革史的研究。

三、社会改革的全方位剖析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是各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作用的矛盾统一体。它具有从要素的量的组合达到系统整体的质的飞跃的总效应。社会改革实际上也是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改革的发生、发展、成败、得失，涉及到社会的各种要素，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以至社会习俗、行为方式、思维方法、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作用、矛盾、制约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①，因此应该对晚清改革的社会大系统从各类要素、各种层面及其联系、作用，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和剖析。

有些角度是过去论者较少涉及的，如晚清改革的时机问题，晚清中国究竟有没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而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机会和可能性呢？实际上挑战与机遇往往是同时存在的。外国的侵略和对外战争的失败，既是外来的打击和压力，常常也可以成为引发大变革的刺激和动力，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晚清鸦片战争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以至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还拥有对本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权。但是清政府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坐失良机，以至自主选择余地越来越小，最后陷入不可救药的地步呢？其中原因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又如晚清改革的社会承受力问题也值得研究。改革关系到各阶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417页。

级、阶层、集团的权力、利益的再分配。改革措施能否为社会承受，除了直接利害关系外，还涉及到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心理定势等因素。晚清改革遭到巨大阻力，一方面反映中国守旧势力与传统影响之强大，另方面也表现出晚清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较脆弱、心理适应性较差。

晚清改革的政策、策略的失误，关系改革的成败。这在戊戌改革中表现最明显。过去论者常常批评戊戌维新的软弱和保守，可是往往忽略了维新派和光绪皇帝急于求成的重大策略失误。康有为对改革估计过于乐观，甚至对光绪皇帝鼓吹：“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①而年轻的光绪皇帝更是急躁，在一百零三天内，如急风骤雨接连下了那么多道改革诏令，企图立竿见影，一步到位，完全不顾社会承受能力和各利益集团的反应。结果却使改革者“如投身于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②改革目标反而欲速而不达。

以官制改革为例，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下令精简机构裁汰冗散衙门和官吏，这本是政治改革的应有措施。但此事触及大批官员的利益和出路，需要逐步推行，妥善处理。而光绪皇帝却操之过急，竟然要求各省限一个月之内把“现有各局所中冗员，一律裁撤净尽。并将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人员，一律加甄别淘汰。”^③引起官场上下震动，人心惶惶，怨声载道。这样的过激措施，自然大大超过社会承受力，引起旧势力和各级官吏的强烈不满和抵制，增加改革的阻力，加速改革的失败。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145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70页。

③ 光绪皇帝戊戌七月十三日硃改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而改革的失误又往往与改革领导者、执行者的素质、能力、品质，甚至性格、心理有很大关系。就拿戊戌维新来说，中国的维新派领导人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有学问，有政治抱负，却往往缺乏谋略，缺乏政治才干。连梁启超也承认他的老师维新派首领康有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①大官僚李鸿章则把他们视为“书院经生、市井讼生之流，不足畏也。”所以有必要对晚清改革领导者的个人方面因素作深入研究。改革者的文化心态、价值观念也是一个重要视角。如洋务派官僚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他们主张“西学为用”，积极引进西方军事、工业技术，提倡兴办工厂、修筑铁路、建设海军、开办学堂等经济、教育方面改革。然而又同时坚持“中学为体”，拒绝变革封建政治法律制度和儒家的伦理观念及衣冠礼仪等“祖宗之法”。笔者在日文资料中看到一份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的谈话记录很说明问题。李鸿章在谈话中严厉批评日本明治政府的制度、服装改革是违背“祖宗遗志”，“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并断然表示：“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改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②这种立场除了说明洋务派企图维护清王朝和本集团的既得利益外，也反映了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崇古敬祖、重义轻利、华夷思想等传统价值观念对改革的阻碍。

晚清改革的某些层面过去研究比较薄弱，如晚清法律制度的改革，在清末新政中究竟制订了多少新法？吸收引进了哪些外国法律思想和条文？再如清末到底有没有起草出宪法？过去论者一般只提

^① 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四），36页。

^② 木村匡：《森先生传》，日本金港堂，1909，102页。可参见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74页。

到清政府草宪的原则《钦定宪法大纲》。而笔者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汪荣宝日记》手稿，发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钦定宪法》，在清末已经全部起草完成，只是来不及最后颁布，清王朝就灭亡了。在这部宪法的执笔者汪荣宝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草宪的全过程和钦定宪法草案的内容，以及起草者的观点和心态，可以得到对清末宪政和法制改革的不少新认识。^①

此外，如晚清的外交改革、军事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改革，以至风俗改革、文字改革等等，都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史料，进行扎扎实实的专题研究。

晚清改革在中国各地区进行得很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对各地区改革状况作具体的区域研究。以前对湖南、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研究较多，可是一些边远省份、穷乡僻壤是否也吹到了改革之风，究竟实际情况如何？需要作具体考察。有的地区如台湾，在光绪新政时期曾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改革，在台湾的近代化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方面的区域研究，有大量的地方志和地方档案史料可以利用。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应该扩大视野，具体研究晚清改革史上的各种类型、各种身份的人物。不仅是那些著名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尚可作进一步深入研究，还有大量不太著名甚至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也值得研究。通过发掘史料，细致剖析，可以发现这些人物在历史上也有着各自的地位和大小不同的作用。甚至一些普通老百姓的活动，也能从某个侧面反映晚清改革的风貌。如前面提到的汪荣宝，笔者通过对其日记手稿的研究才发现，此人竟是清末新政时期北京政治舞台上极其活跃的角色。他不仅是清末钦定宪法与一系列新法律的起草者，而且还是京城立宪

^① 详见王晓秋《清末政坛变化的写照——宣统年间〈汪荣宝日记〉剖析》，《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派的核心人物和袁世凯智囊团的要员。从这个人物的种种活动和心态变化，可以感受到清末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脉搏。

总之，必须对晚清改革进行全方位的剖析研究，才可能比较全面地把握晚清改革这个复杂社会系统的全貌和实质，并给予科学的评价分析，获得有益的前鉴和启示。

四、中外改革的多角度比较

改革是世界性的历史潮流，特别是近现代的改革，更具有普遍性、国际性的特征。近代以来，世界已经联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因此研究晚清时期中国的改革，也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国际意识。应从世界和亚洲全局的高度去观察中国改革，分析晚清改革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外来影响，并进行中外改革的多角度比较研究。

晚清改革是在世界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发生的。18世纪至19世纪，世界各国不断出现革命和改革的浪潮，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确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中国晚清时期的改革符合时代的潮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晚清改革又是在十分复杂险恶的国际形势下发生的。列强争夺世界霸权和瓜分殖民地的斗争日益激烈，中国逐渐成为列强在东亚争夺的焦点和东方尚未瓜分的最大富源。复杂的国际关系制约着列强对中国改革的态度，也对晚清改革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应从历史事实出发，具体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东亚国际形势，实事求是地考察各国对待中国改革的具体态度及对晚清改革的影响。

正因为晚清改革是在世界改革浪潮中发生的，中国的改革派自然要向国外寻找改革的榜样和借鉴，以制订自己改革的模式和计划。洋务运动时期，已开始对外国史地和改革经验的探求。黄遵宪

的《日本国志》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作。戊戌维新时期，更出现研究外国改革史的高潮。康有为为了探寻中国的改革方案，曾具体研究了俄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美国通过改革或革命兴盛，以及波兰、土耳其、印度等国衰亡的历史经验教训，编纂了各国变政考，向光绪皇帝提出仿效外国改革的建议。他进呈的《日本变政考》，简直成为光绪实行改革的蓝图。康有为宣称：“切于中国之变法自强，尽在此书。”“我皇上阅之，采鉴而自强在此。若弃之而不采，亦更无自强之法矣。”^①

清末新政改革也是以日本为楷模进行的。清政府先派五大臣赴各国考察，经过调查比较后决定采取日本模式，然后又派大臣专门考察日本宪政。20世纪初，清政府还派遣大批官员赴日本考察取经，考察对象包罗万象，从官制、军制、法律、教育，到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以至警察、监狱等等。有的省甚至规定新任地方官员必须先赴日本考察，再回来上任。笔者曾查阅大量访日游记和考察报告，其中不乏对日本改革和中国改革的真知灼见。此外，还有不少士绅自费东渡游历访问，学习日本维新经验。大批官费、自费留日学生则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和介绍日本新政，翻译日本与西方的著述。许多留日学生归国后成为清末新政改革的骨干分子。如当时的新政机构宪政编查馆与法律修订馆的重要成员，大多是留日归国学生，很多重要法律以至宪法草案，都出自他们之手。晚清改革如何吸收采用外国改革经验，也是一个很有趣味值得研究的课题。

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出现改革新浪潮，在欧美亚非各国都发生了各种类型的改革。如欧洲的先进国家英国通过关税改革、议会改革，法国经过拿破仑三世的改革，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

^①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故宫博物院藏进呈本。可参见王晓秋：《康有为的一部未刊印的重要著作——〈日本变政考〉评介》，《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展。欧洲后进国家如俄国通过 1861 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使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德国则经过普鲁士王国的改革和王朝战争，1871 年终于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美洲的美国经过 1861—1865 年的南北战争，摧毁了黑奴制度，并改革土地政策、关税制度、劳工政策，也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地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839 年由外交大臣雷希德帕沙宣布《御园敕令》，开始各项改革。以后又有新奥斯曼党人的土耳其立宪运动。西亚的伊朗则有 1848—1851 年的密尔扎·塔吉汗的改革。在东亚，除中国以外有众所周知的日本 1868 年明治维新的成功，成为日本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日本通过各项改革逐渐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并发展成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强国。朝鲜也发生了开化派的改革运动。在东南亚，泰国国王拉玛四世（1851—1868 在位）和拉玛五世（1868—1910 在位）相继实行各项改革，维护了民族独立，使泰国成为东南亚唯一未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国家。缅甸的曼同王（1853—1878 在位）也曾实施一系列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此外，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亚洲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多次发动争取改革的运动。如菲律宾的宣传运动，印度的国大党运动，越南的维新运动等等。以上各种类型国家的形形色色改革，各有自己的背景、条件和特点，如果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与中国晚清改革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深入分析其共同性、差异性和规律性，将会大大拓宽我们的视野和思路，深化对晚清改革的认识。

马克思曾经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